

从帝国叙事到“美猴王”奇观

——论《人猿泰山》的早期中译本《野人记》

陈 庆

内容提要 《人猿泰山》的早期中译本《野人记》1923年开始连载于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小说世界》第1卷第12期至第4卷第3期上，译者胡宪生。本文通过讨论这本小说的翻译，思考西方浪漫主义小说中的帝国叙事与民国初年通俗小说奇观化之间的断裂、冲突与历史关联。可以发现，胡宪生的译本有意削减、省略、改写《人猿泰山》原作中的帝国叙事，糅杂了20世纪20年代本土知识分子有关“民众文学”的集体想象与古典白话小说的经典形象，将之建构为来自异域的“美猴王”奇观。《野人记》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叙事与本土文化、异域浪漫观念与中式传奇之间竞争与协商的场所，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20年代小说翻译与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获得新的线索。

关键词 《人猿泰山》；《野人记》；帝国叙事；“美猴王”奇观

一

《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是美国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 1875-1950)创作于1912年的长篇丛林探险小说,该书一经出版即畅销不已,其后30年间,巴勒斯以泰山为主角创作了一系列丛林探险小说共计24部。其中最早的一部《人猿泰山》小说中译本《野人记》由胡宪生翻译,1923年开始连载于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杂志《小说世界》第1卷第12期至第4卷第13期上。该小说连载后大受欢迎,商务印书馆又请曹梁、俞天游、李毓芬、张碧梧、吴衡之、张桐馆等人将“人猿泰山”系列的其他小说译成中文,陆续在该杂志上刊登发表,并于1925年至1927年间出版“人猿泰山”系列丛书译本全套10本。有商务印书馆译本的成功在前,此后又有百新书店、大通、启明、大华、天下等多家书店、出版机构邀约不同的翻译家重译、另译这一系列的小说共计46种^①。

作为丛书系列的第一册,《人猿泰山》在1912年初版时被标识为“一本丛林浪漫小说”,后由好

莱坞改编同名电影风靡全球。“泰山”从代表由人猿抚养长大的白人男性形象变成一个具备特定意涵的词汇,并将丛林冒险、人类英雄、浪漫爱情等意义元素囊括入内。其中一个明显例子莫过于二战期间史迪威将收复缅甸的战略计划取名为“人猿泰山”^②。从这一代称中我们不难发现,缅甸的丛林作战呼应非洲小岛的蛮荒生长地,反法西斯战争的政治立场呼应泰山的英雄主义情怀,驻守缅甸的日军呼应泰山的老对手们——野兽与野蛮的黑人部落。所有这些元素聚合在“人猿泰山”这一特定词语中,凸显了战略计划中的“征服”与“拯救”意味。在此,虚构小说产生一系列实际效用,反过来又强化了虚构小说的主角——“人猿泰山”作为专有名词的意义生成。也正因为这样,“人猿泰山”被从文本内外生长的环境剥离出来,转化为一个抽象且固化的文化符号,使得小说本身许多政治层面与文化层面的问题无法得以充分讨论,其结果就如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批判美国怀旧电影所提到的那样:“所有的布景都经过策略性的设计,独具匠心地避开大多数正常情况下暴露美国正处于跨国时期的信号……就好像(叙述)被搁置在一个永恒的三十年代,超越了真实的历

史时期。”^③

将《人猿泰山》放在一个复杂的视野下重新考察原作中呈现的语言冲突、身份认知困境,以及这些冲突与困境背后隐藏的帝国叙事,这与本文探讨的早期中译本《野人记》有密切关系。因为原文本中由不同语言体系而带来的冲突与分裂状况,恰好是译本有意削减、遮蔽与改写的地方。这种翻译上的处理背后隐藏的政治文化意识,与“五四”以来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市民、古典与新小说等来源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换言之,译本成为不同语域场之间竞争与协商的场所。本文正是试图以此为立足点,探寻民初翻译小说与市民文学生产之间关系的新路径。

《人猿泰山》小说最早的中译本是1923年由胡宪生所译,刊登在《小说世界》上的《野人记》。但考虑到该小说在被译成中文以前,译制版电影已先行一步在上海公映,从一个更大的翻译范畴上看,胡宪生的译本应称之为“早期中译本”而非“最早中译本”。译者胡宪生为1910年“庚子赔款”第二批赴美留学生^④,获康奈尔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他留存下的信息不多,仅有的材料显示在《野人记》译成发表这一年,即1923年,胡宪生的身份是上海新学制课程标准委员会外国语类审定专家。其后两年,他一直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小学英文教科书编委,由他编订出版的教科书包括《新学制初中英语读本文法合编》等^⑤。

1923年有两则广告与《野人记》有关:一则登在《小说世界》杂志,它这样介绍该译本:“这篇小说的事实,美国已经制成长部影片,在上海开映时,万人空巷,可见里面的情节,真离奇到了二十四分了。现在经留美的文学硕士胡宪生先生,译成汉文,笔力老道,的系名译。”^⑥另一则登在《申报》上,属于《小说世界》的订阅广告,上面写着:“这部小说合侦探、义侠、冒险、爱情、科学冶为一炉,就是著名影片《太山历险记》及《太山之子》的本事英文原本,销遍全球。现经留美硕士胡宪生先生译成中文,笔力老到,并有奇异之插图多幅,无论看过或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不可不看这部小说。”^⑦

这两则广告提供了一些基本信息:首先在《野人记》产生之前,“人猿泰山”的故事已经由电影传入我国,并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市民阶层中

有较为广泛的接受基础。但“小说译本”与“电影译本”之间不是单向的传播/接受关系,与其说是时间先后的线性承继,不如说它呈现某种“互文性”交织。也就是说,尽管小说中译本的生产不可避免要受到电影中译本的影响,却又不仅是它的影响与回应,而更像以某种“匡正”的姿态,重塑“人猿泰山”故事在本土环境中的“应有之相”。

其次,倘若上述说法成立,则小说中译本的生产顿显微妙,因为它不仅要再现原著“离奇到了二十四分”的情节,而且需“合侦探、义侠、冒险、爱情、科学冶为一炉”。如果说前者代表中译本需呈现国外冒险小说“域外奇观”的功利性职能,后者则预示这一故事终将纳入晚清以来白话文市民小说的脉络之中,纳入20世纪20年代通俗翻译小说的整体框架内。因此无论“离奇”也好,抑或“合侦探、义侠、冒险、爱情、科学冶为一炉”也罢,《野人记》都将对“人猿泰山”故事进行势在必行的本土改造。也就是说,研究《人猿泰山》早期中译本的关键性问题从胡宪生的翻译是否忠实于巴勒斯的原本,悄然转换成泰山的冒险故事到底在哪些地方、多大程度上违背了20世纪20年代中文语境中有关翻译小说的审美趣味、话语体系甚至是价值评判?以这一问题为思考背景,先要重审的便是《人猿泰山》原本。

二

《人猿泰山》到底是本什么样的小说?众所周知,《人猿泰山》故事出自美国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之手。出版这本小说之前,巴勒斯仅发表过两个科幻故事,穷困潦倒。《人猿泰山》创作于20世纪初期正是美国移民浪潮高涨的年代——始于1820年左右的第二波移民浪潮,在《人猿泰山》出版的1912年前后达到顶点。与第一波移民潮中多为信仰基督教、操持英语的白种人不同,第二波移民潮来临时,大量非英语地区人群、非基督教信仰、非白种人涌入美国。不同大陆、信仰、种群、种族的移民给美国普通阶层长期以来形成的伦理原则和社会文化带来极大的冲击,同时也激起新教白人群体的激烈反弹。

巴勒斯终生都对自己身上具有“盎格鲁—撒

克逊”血统深感骄傲^⑧，这一事实与第二波移民潮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结合起来，能为我们理解《人猿泰山》提供新的视角。巴勒斯曾说过，整部《人猿泰山》小说实际上只围绕了一个问题展开，即当一个出身极为显赫的白种人婴儿在丛林中由野兽抚养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⑨。而在小说文本中，叙述者总在不厌其烦地强调泰山与生俱来的英国贵族血统，正是这血统令泰山跨越未被教化的状态，听从超验的理性律法的召唤，并通过掌握代表“文明”与“先进”的书写文字——英语，战胜代表野蛮和愚昧的丛林口头语言——人猿语。在泰山身上，“先天”本性（nature）必然会战胜“后天”环境（nurture），他最终肯定、也只能回归文明社会对理性、对具备理性之人的标准中。泰山故事中的所有冒险与浪漫情节，都在不同程度地回应他身为白人的种族优势，以及他继承自勋爵父亲的高贵血脉。借着浪漫小说的伪装，巴勒斯小心地建构了泰山征服丛林的天然合理性，尽管征服过程中的暴力总是被美化为男女主人公的种种历险情节。这样说并不是要将《人猿泰山》简单粗暴地解读成“白人中心主义”文本，而是为了说明泰山从野蛮走向文明并最终迎娶美人的过程，不仅是浪漫小说情节的滥觞，还交汇各种错综复杂的文化体系。作为文化交汇的集中产物，人猿（野兽）、未开化的人（黑人）、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劳工阶级）、贵族白人男性（征服者）等多重“人”的状况皆在泰山身上作用、竞争与角力。

时至今日，批评巴勒斯写作中流露的西方文化霸权虽仍具有意义，但这样的批评也容易得出封闭性定论，即匆忙以“欧洲/土著”的模式替代浪漫小说中的“冒险/爱情”模式。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帝国叙事如何在人物塑造上发挥律法的作用？泰山身上交汇的不同语言体系为何最终能自然进化为唯一的文明社会理性标准？在这两个方面，美国理论家艾略克·谢菲茨（Eric Cheyfitz）的翻译理论著作《帝国主义诗论》（*The Poetics of Imperialism*）可称得上力作，因为他力求将小说文本中的翻译问题放置回欧洲帝国主义的殖民历史中。当分析到泰山撬开已故生父的小屋、发现识字课本、自学英语，未能学发音却能流畅地以英语写作时，谢菲茨指出泰山实际上是一个“译

者”，他的翻译跨越了不同的物种，从人猿语到英语再到法语，这个过程重复了17世纪以来欧洲殖民者的经验，再度以“文明”书写语言代替“野蛮”口头语言的“白人神话”（White Myth）。不同的语言体系之间原本应该借由翻译呈现的困难、争议、冲突成分全都在小说叙述中缺席，因为泰山的强大白人血统为欧洲语言天然赋权，这一抽象的律法凌驾于丛林之上，从根本上便取消了任何文化内部交流的可能。他这样写道：

泰山通过翻译书本所获得的权力令他从人猿跨越而成英国人，更确切地说，是从操持口头语言（人猿语）的人猿跨越到掌握书面语言（英语）的英国人。在其父留下的匕首（在小说中，这代表掌握书面语一方所拥有的控制权，或代表欧洲语言及“先进”工艺）的帮助下，泰山获得了凌驾于其人猿族群之上的帝国权力，因为人猿不能像泰山那样拥有丰富的词汇，他们只能借助于泰山的翻译。^⑩

然而，作者试图让“译者”泰山穿梭于不同语言体系获得确切身份认知的叙述却总是处在自相矛盾之中。泰山不能说英语，他的英文学习需要先将之翻译成猿语，他有关知识的口头表达同样也需先翻译成猿语；泰山无师自通学会英文阅读及写作，与其说是书面语言对口头语言的胜利，不如说是书面语言试图将泰山建构为知识的客体。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泰山只会说人猿语，高级的书面语言（英语）带来的知识只能靠低级的口头语言（人猿语）来表达，它带来的困境是双重的：其一，泰山能够将口头语言转换成书面语言，却无法反过来将书面语言转换成口头语言，这导致他无法完全被建构为欧洲知识的客体；其二，正因为学习了英语却无法说和听，令泰山认识到自己与其他说英语的白种人全然不同，进一步加大他与来自文明世界的欧洲人之间的差距，而不是顺理成章建构自己有关白种人贵族后裔的身份认知。换句话说，从人猿“进化”到人，再从人“进化”到出身高贵的人，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哪怕到小说末尾作者让泰山学会说法语来弥合书面语与口头语的矛盾状态，然而由翻译带来的异化问题却总在那里，无法被浪漫主义叙事所掩盖。

在此基础上再来观察胡宪生译本《野人记》，却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人猿泰山》原作中存在的语言冲突、身份认知冲突、欧洲征服者与丛林的冲突，理性与野蛮的冲突等问题，在中译本中一再被弱化、削减、改头换面。原作中数次提及人猿语词汇贫乏、人猿语中没有“人”这个词汇，以与英语体系的丰富与完备形成对比，但这些呈现英语作为高级语言优势的句子，中译本皆省去不译。较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泰山第一次自学英文的段落，这是《人猿泰山》中一处重要情节，也是谢菲茨所说的，泰山通过掌握文明语言——英语，从此迈出从一个物种神化为一个人种的第一步^①。原文中巴勒斯使用的措辞非常明显地表达了这一意图，他先用“小原始人”（little primitive）来指代小泰山，继而明确指出泰山自学英语的画面寓意深刻，它昭示着某种原始的探索（primordial groping），昭示泰山从无知的暗夜（the black night of ignorance）走向知性之光（the light of learning）^②。但这些表述在《野人记》中全然不见，而是被胡宪生置换成下面的句子：

（太山）一对聪明伶俐的点漆双瞳，目不转睛的注定了书中的画和字，像盲人夜行一般，想独自发明那书中的一线曙光，这种情景，教我们看着，不由得又是可怜他，又是喜欢他，想这孩子将来一定有成的。（第七章）^③

从这段译文中可见，胡宪生取消了原文本中“白人神话”的重要前提——教化野蛮人，取而代之的是本土化儿童教育的想象性场景，且添加了原文本中不曾出现的叙述者声音，将掌握高级语言意味着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帝国主义话语拉回到本土语境中勉励孩童“唯有读书高”的价值体系上。这样的转换最直接的作用便是抹去英语的权威性，同时抹去的还包括“高级语言/低等语言”“文明语言/野蛮语言”的区分。英语在中译本中被视为一种普通语言，一种能让孩童增加见识的普通知识，从而令泰山自学书面语背后由权威语言赋予的天然权力被拉低成为一幕习得语言的世俗场景。由此，原文本汇聚在泰山身上的语言冲突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对儿童好学品质的赞美及世俗社会对其美好未来的惯常展望。

无独有偶，在另一处具有代表性的情节翻译

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削减。即泰山在自学英语后，骤生羞耻心想穿衣蔽体，原文中巴勒斯这样写道：

At the bottom of his little English heart the great desire to cover his nakedness with CLOTHES for he had learned from his picture books that all MEN were so covered, while MONKEYS and APES and every other living thing went naked.

CLOTHES therefore, must be truly a badge of greatness; the insignia of the superiority of MAN over all other animals, for surely there could be no other reason for wearing the hideous things.^④（在这个小英国人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一股强烈的欲望，他想穿上衣服遮盖赤裸的身体，因为他从图画书中学习到，“人”都要穿衣服，“猴子”“人猿”和其他动物则不用。因此“衣服”一定是伟大的标志，是“人”优于其他动物的徽章，否则没有其他理由需要去穿上这么讨厌的东西。）

《野人记》译文却如下：

他心里还有一个意思，与这个不同些，原来他从晓得自己是个人以后，见图画里的人身上都有皮盖着，心里异常的羡慕。他也渐知人比猿猴尊贵，那尊贵的地方，就在这件皮上，不然，何以猿猴身上没有这个东西。（第八章）^⑤

两相对比可发现，原文中的“小英国人”“人都要穿衣服”“衣服一定是伟大的标志”“是人优于其他动物的徽章”等表述中译本均不见。“衣服”在原文中是一个专有名词，一个理性之“人”的标准，而胡宪生将之翻译为“皮”，将泰山通过穿衣“成为人”的意义降低为野人“拟人”的程度，且在中文语境中，“皮”“皮衣”的戏仿意味远胜于原文中穿衣蔽体优于其他动物的赋权意味，于是，泰山迈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性情节被转换成野人对人的滑稽模仿。

需指出的是，上述分析并不等于证明了胡宪生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认识到《人猿泰山》小说中隐含的文化霸权，继而在译本中有意改写原小说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胡宪生在《野人记》对“人猿泰山”故事中复杂的语言关系的删减化处理，无形中确实消解了原文本

的帝国叙事逻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翻译策略？这就需要进一步探讨20世纪20年代影响《野人记》生产的文化因素。

三

胡宪生译本对人猿泰山故事所进行的中国式改造，不单只是现代小说翻译史上“归化翻译”的一个典型案例，如果我们将《野人记》放回当时的中国本土环境中考察，还能触及到以往同类研究中未能深入讨论的一些问题，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特殊性。这一时期正处晚清以来纷繁多样的翻译浪潮——特别是以林纾等人为代表的小说翻译高峰尚留余韵，而后来以苏俄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风格又尚未形成唯一的权威话语系统。在这样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小说翻译承担了什么角色，它又为译本预设了什么样的阅读愿景？

胡宪生翻译“人猿泰山”故事的初衷已无从考证，但依然可以观察到《野人记》在何种语境下被生产与传播。先看组织翻译、刊登泰山冒险故事的通俗杂志《小说世界》。如前文所说，这是商务印书馆旗下创刊于1923年的通俗小说杂志，据章锡琛回忆，这本杂志的办刊初衷是由于茅盾改版《小说月报》后，已有的“鸳鸯蝴蝶派”文人无从安置，为了不得罪这些人，商务印书馆不得不另创《小说世界》收容他们的稿件以示笼络^⑥。但章的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小说世界》自创刊之日起便销量极大。1923年第2卷第6期上“编辑琐话”这样写道：“本刊的销数之多，出于意料之外”，“第一期到第八期已经四版还是不够分派”，“现在正预备五版或六版”^⑦；到第2卷第9期，该刊编辑甚至担心再版太多，“那些铜版图已经模糊极了，倘要第六版恐怕要变成一块黑版”^⑧。同年3月29日，《申报》上登出该杂志的销量：“（《小说世界》）现在销出四万份，为各界所爱读”，而根据后人回忆，这本杂志“网罗全国文艺作家撰稿，销路之广，开全国杂志新纪录”^⑨。由此可见，哪怕是出于对市场的预测，商务印书馆也不会因为改版《小说月报》便放弃通俗小说阅读这块庞大的阅读群体。同时，正由于该杂志并非以笼络“鸳鸯蝴蝶派”的文人为主，因此在选稿上体裁丰富、内容庞杂，小说、译稿、散文、

文论、剧本、风俗趣谈、科学常识、漫画、乐谱均可见到。单就小说而言，《小说世界》上选用的稿件也早已超出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的范畴，尤其翻译小说这块，不仅有契科夫、泰戈尔、莫泊桑、都德等短篇小说译作，还专设“名家小说节本”栏目，将《父与子》《复活》《块肉余生记》《苦儿流浪记》等20世纪20年代已脍炙人口的名家译作删节重刊，使读者能重温这些故事。曹冷巢后来在《题〈小说世界〉（赠寄尘）》一诗对该时期的杂志风貌描述如下：“眼前石屋带书象，小说家明因果状。两种情怀俱可谅，是恩是怨无性相。抱微言者太史氏，二十高名动都市。收拾遗闻浩无际，网罗文献吾倦矣。”^⑩诗中已点出杂志用稿题材宽松，故事无分中外，题材广泛，“明因果”与“无性相”两种情怀俱可入选；“遗闻”“文献”这样的猎奇好古倾向仍然属于其审美旨趣的范畴。

钱玄同在《晨报副刊》上以“疑古”为笔名发表文章讥讽《小说世界》，认为它所谓的新旧兼备实质“不伦不类、非驴非马”^⑪，但联系到这一年《文学旬刊》上的“民众文学”大讨论可发现，《小说世界》的采编实际上体现了商务印书馆令一本通俗小说杂志合乎时宜、契合知识界有关“民众文学”集体想象所做出的努力。1922年由俞平伯、许昂若、叶圣陶、朱自清等人发起的“民众文学”大讨论影响甚广，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沈雁冰也同王砥之、张侃浙在《小说月报》发表文章回应这一话题。俞平伯将“民众文学”的内涵一再扩大，从“平民文学”“大众文学”扩展到“民间故事”“神话民谣”“曲意杂谈”等内容，将各种俗文学文类囊括入内^⑫。在这个宽松的框架下，主编叶劲风等人将《小说世界》副刊之一命名为《民众文学》，在《申报》上登出《小说世界》的主旨乃是“提倡民众文学之先声”^⑬，不可不谓紧跟风潮，昭告某种革新俗文学的展望。数年后，刘秩升在《小说世界》上发表的《题民众文学》短诗，更是将俞平伯等知识精英为“民众文学”框定的范围与《小说世界》的组稿要求相挂钩：“牠（指《小说世界》杂志）里面有诗歌有笑话，有插图有故事，并不是那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乃是自然的抒情的平民文学，不是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献，乃是新鲜的诚朴的写实文学，不是迂晦的艰涩的山野文学，

乃是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²⁴

在上述语境中,《野人记》并非刊登在《小说世界》的孤立翻译个案,而是与高达观译都德、莫泊桑,胡寄尘译契科夫,沈雁冰译《皇帝的新衣》差不多同一时间刊登于同一本杂志的众多译作中的一本。这些翻译小说共同建构了有关异域“民众文学”的集体想象,它们既无需承担晚清民初翻译小说“开启民智”的政治性职能,又走出宣统至民初“吾国盲译欧美小说书,方自诩足当社会教育之称”²⁵的劣质翻译泛滥状况。小说选择上不再局限于侦探、言情两大类,呈现多样化、平民化趋势;译笔上也不再拘泥于文言笔法或文白相间,更多的译者在章回体小说的叙述模式下加入更为自由的欧式白话句法。这当然不是说这一时期《小说世界》上刊登的译作均呈现某种整齐划一的状态,而是表明传统的章回体白话文小说模式与新文化运动后急剧生产的现代汉语表达在《野人记》这样的译作中交汇竞争,它所带来的一个明显后果便是使得翻译小说的职能从周桂笙所说的“输入文明之术”“变化固执之性”²⁶的小说界革命先驱,转换为“自然抒情”“明了通俗”的域外“民众文学”。

此外,近代以来关于“民族”“种族”等概念的引入与讨论、重整与变迁,也为通俗小说翻译的“去殖民化”提供宽泛的思想史背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林纾译哈葛德(H. Rider. Haggard)小说。林纾一生所译哈氏小说多达23种,他曾明确指出哈葛德探险小说中有西方掠夺非洲的殖民观念:“先以侦,后仍以劫”,“至无可劫,西人始创为探险小说”²⁷;然为了“行将择取壮侠之传,足以振吾国创尚式精神者,更译之问世”的翻译目的²⁸,需对于哈氏小说中的劫掠之意略写或改写。然而胡宪生“去殖民化”的翻译策略,其目的却与林纾不同,这里以《野人记》中处理泰山身份认知的段落为例。原本中泰山的三重身份:血缘上的白人贵族身份、成长中的人猿身份、“理性之人”的抽象身份,到了译本中均被不同程度地改头换面,一种模糊等级、阶级、种族甚至物种界限的翻译策略在《野人记》中屡屡出现。从对泰山称谓的翻译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改写:《人猿泰山》称呼主人公除了“泰山”之外还有几种表达方式,比如表现其贵族出身“泰山,格里斯多克勋

爵”(Tarzan, Lord Greystoke)、凸显其欧洲国别身份的“小英国人”(little English man)、“英国绅士”(English gentleman)、强调其战斗能力的“强大的猎手”(mighty hunter)、“勇猛的战士”(mighty fighter)等,所有这些,在中译本里不是被省去不译,便是代之以“英伦小童”这样含混的称谓。

如此一来,泰山与简一见钟情背后的重要隐喻作用也同样被中译本摒弃。原文中为了确保泰山没跨种族通婚,作者安排他爱上无论在物种、人种、出身都与之相匹配的白种人女孩简。为确保这种“种族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原文中不惜堆砌词藻用以赞美泰山面对简时自然萌发的绅士风度:

It was a stately and gallant little compliment performed with the grace and dignity of utter unconsciousness of self. It was the hall-mark of his aristocratic birth, the natural outcropping of many generations of fine breeding, an hereditary instinct of graciousness which a lifetime of uncouth and savage training and environment could not eradicate.²⁹ (这是一个庄严的、勇敢的小小致敬,泰山无意识间做出来,却表现得如此优雅高贵,它是这位青年贵族出身的印记,是几代人良好教养的自然流露,哪怕粗鲁野蛮的训练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也无法根除这种与生俱来的品质。)

有趣的是,《野人记》将这段话改写成“泰山毕竟是个圆颅方趾的人,有些本事不必良师教导自然就会的”,“他虽生长蛮邦一生一世与鹿豕为群,那遗传的天性是不能泯灭的”(第二十章)³⁰。与原文相比,胡宪生用“天性”一词将种族意识形态原则转换成中文语境中少男少女互相爱慕的“人欲”原则。于是泰山无需先具备文明人的血统才能接受来自另一个文明人的爱与教化,泰山依然可以与简相爱,他的爱情叙事至此与原本文本中隐含的文明律法、文明婚姻无关。

泰山的多重身份在译本中统一在中式语境中有关异域的民众文学、更确切地说在异域人猿传奇的想象框架下。身份分裂与身份重合等问题在译本中皆被削减不见,只剩下一个与中国语境相契合的桀骜不驯的猿猴领袖传奇形象,于是自然而然地,胡宪生挪用了中国本土家喻户晓的《西游记》中对猴子孙悟空的称谓,将原文中的“格

里士多克勋爵”翻译成“美猴王”：

原文：And thus came the young Lord Greystoke into the king-ship of the Apes.^④（就这样，年轻的格里士多克勋爵登上了人猿部落的王位。）

译文：从此英伦小爵士便做了美猴王了。（第十一章）^⑤

与“美猴王”相匹配的中式句式表述比比皆是，比如“却说美猴王登基后”“美猴王自从迁都后”“唤齐了人猿升堂”“钦此”“美猴王的职务天大不过是这一类事”（第十二章）^⑥。就这样，《野人记》在现代民众文学的集体想象框架下借用古典白话文小说的经典形象，将人猿泰山的冒险浪漫故事转换成20世纪20年代通俗市民流行文学。可以说，中译本以异域“美猴王”奇观取代原文本帝国叙事的翻译策略，不仅是为了迎合本土市民小说审美趋势，还成为中译本解决原文本中不同语言冲突的特殊方式——毕竟在中国语境中，现成的美猴王不需像泰山那样跨越人/兽的双重语言体系，也不用成为一个译者，他永远操持一种语言，那就是人、精怪、鬼神、仙佛的通用语汉语。

由这一转换带来翻译上的颠覆性改写出现在原文中有关“文明人/野蛮人”表述上。整部《人猿泰山》中描述的人兽对立实际上包括文明的人与野兽、野蛮人之间的对立。在巴勒斯笔下，岛上的土著黑人与泰山的猿猴同伴、狮子大象邻居并未有本质区别。黑人在文本中是康德所说的“未受教育之人”（uneducated）、“生人”（man in raw），未经文明熏陶，语言体系与人猿语一样不发达，愚昧迷信（将泰山误以为神）又血腥残忍（吃人），他们甚至杀死了泰山的人猿养母卡拉。在这样的表述中，黑人是天然低下、未被理性律法眷顾的种族，因此哪怕文中提及白人对黑人村庄的掠夺和洗劫，巴勒斯也只轻描淡写道这群黑人“for they were fleeing from the white man's soldiers who had so harassed them for rubber and ivory”^⑦（正在逃离白人士兵的追击，那些白人骚扰他们，强迫他们交出橡胶与象牙）。在他的笔下，淡化殖民者的残暴罪行，将烧杀抢掠的罪行归咎于个别道德败坏的白人军官及其士兵。但上述描写在《野人记》译文中不仅被全然删减，且被改造成以下表述：

原来这一群黑人，本是聚族而居，安分

营生，好好儿的度日，蓦地间来了几个白人，带着许多士兵，到他们村里来，又要树胶，又要象牙，他们搅得恨极了，便倒转来杀了一个白人一小队士兵，杀死的人一个个煮来吃，吃了好几天才吃完。不料这一杀不好了，那逃得性命的白人带了大队的士兵来村里报仇了，血战多时，村中人死了无数，前次煮人吃的，现在给人家煮来吃，天道好还，报施不爽，真有这个道理。（第九章）^⑧

原文中并无黑人安分守己过自己营生的描写，也没有黑人与白人将各自的敌人烹饪吃掉的情节，更加没有“天道好还，报施不爽”这样因果轮回的价值观。这一改写带来最直接后果便是将白人与黑人置于同等的价值判断框架中，甚至暗示事态恶性发展的前提在于白人先行掠夺黑人村庄，这才令黑人“搅得恨极了”。到了“吃人”环节上喜剧性地加入白人士兵也将黑人战俘“煮来吃”，双方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文明多少。在《人猿泰山》原文本中，泰山不吃人原本是他从动物迈向理性之人的关键性一步，黑人吃人也是这一种族野蛮残忍的一个重要特征；中译本将“吃人”一幕改写为白人士兵也参与其中，就其野蛮程度而言不遑多让，这对于整部小说竭力渲染“文明/野蛮”等级标准而言不啻为极大的反讽。需指出的是，中译本的这一反讽并非刻意营造，而是视为某种发生在遥远异域的奇观场景被呈现出来。这一场景尽管包括了非洲荒岛、黑人部落、白人遗孤历险等陌生化情节，然而却与中式市井小说的价值体系暗中相合；《人猿泰山》文本中的“白人神话”意识形态、种族等级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在《野人记》中均被模糊化处理，而来自异域的“美猴王”传奇中式叙事模式却被无形凸显，所有这些因素，共同营造出符合20世纪20年代“民众文学”范畴内的娱乐性审美趣味。

小结

由《野人记》开始的人猿泰山故事一路畅销，多次再版，巨大的商机吸引不同书局组织译者重复翻译这一套丛书。小说热销的状况虽与民国期间上海引入米高梅电影公司制作的《人猿泰山》系列电影有关，但这一系列丛书的畅销却是全国

各大城市范围内的畅销,而非仅限于放映电影的地区,因此其广受欢迎的原因很可能与中译本的有意改造,尤其是由胡宪生开创的异域“美猴王”奇观表现模式有关。胡宪生之后,商务印书馆还陆续推出由俞天游、李毓芬、张碧梧、吴衡之、张桐馆等人续译的同系列丛书,从书名翻译上亦可窥见这一“美猴王”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得以延续。如俞天游所译书名为《猿虎记》《弱岁投荒录》《古城得宝录》;李毓芬所译书名为《兽王恩仇录》;张碧梧所译书名为《重圆记》;吴衡之所译书名为《宝窟生还记》;张桐馆所译书名为《倭城历险记》等。可以说,由于中译本最大程度地削弱、遮蔽甚至是转换了原文本中既定的“白人神话”意识形态,令文本中非政治化的叙事与20世纪20年代宽泛的“民众文学”集体想象发生勾连,使得人猿泰山的故事在本土语境中得以生长,成功转化为符合市民阅读趣味的异域“美猴王”历险故事,并促进其后一系列续作和中国式人猿泰山小说、电影的产生。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GD16CWW04)、中山大学2017年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17WKPY57)阶段性成果]

- ①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外国文学》,第340—34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 ②何虎生、何桂宏编著:《抗日战争之正面战场》,第307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版。
- ③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 Press, 1991, pp. 20—21.
- ④《取定游美学生名单》,《申报》(上海版),1910年8月9日。
- ⑤《推定新学制课程标准审核员》,《申报》(上海版),1925年4月2日。
- ⑥胡宪生译:《野人记》,《小说世界》第2卷第12期,1923年6月22日。
- ⑦《〈小说世界〉出版了》,《申报》(上海版),1923年3月27日。
- ⑧⑨Irwin Porges, *Edgar Rice Burroughs: the Man Who Created Tarzan*, Provo, U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3—14.
- ⑩⑪Eric Cheyfitz, *The Poetics of Imperialism: Translation and Colonization from the Tempest to Tarza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p. 16, p. 10.

- ⑫⑬⑭⑯⑰⑱Edgar Rice Burroughs, *Tarzan of the Apes*, Published by Planet eBook. 2011. p. 63, p. 78, p. 234, p. 119, p. 87.
- ⑲胡宪生译:《野人记》,《小说世界》第2卷第5期,1923年5月4日。
- ⑳胡宪生译:《野人记》,《小说世界》第2卷第6期,1923年5月11日。
- ㉑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第11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 ㉒《编辑琐话》,《小说世界》第2卷第6期,1923年5月11日。
- ㉓《编辑琐话》,《小说世界》第2卷第9期,1923年6月1日。
- ㉔《叶劲风先生为本刊写稿》,《新重庆》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30日。
- ㉕曹冷巢:《题〈小说世界〉赠寄尘》,《小说世界》第14卷第14期,1926年4月2日。
- ㉖疑古:《“出人意表之外”的事》,《晨报副刊》,1923年1月5日。
- ㉗俞平伯、许昂若、叶圣陶:《民众文学的讨论》,《文学旬刊》第26期,1922年1月21日。
- ㉘《〈小说世界〉广告》,《申报》(上海版),1923年2月11日。
- ㉙刘秩升:《题民众文学》,《小说世界》第15卷第7期,1927年2月11日。
- ㉚樊:《小说界之评论及意见》,《申报》(上海版),1910年1月20日。
- ㉛周桂笙:《〈新庵谐译初编〉自序》,上海周树奎桂笙戏译、南海吴沃尧跋人编次:《新庵谐译初编》,清华书局光绪二十九年四月版。
- ㉜林纾:《〈雾中人〉叙》,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3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 ㉝林纾:《〈埃及金塔剖尸记〉译余剩语》,林琴南著、吴俊标校:《林琴南书话》,第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㉞胡宪生译:《野人记》,《小说世界》第3卷第7期,1923年8月17日。
- ㉟胡宪生译:《野人记》,《小说世界》第2卷第9期,1923年6月1日。
- ㊱胡宪生译:《野人记》,《小说世界》第2卷第11期,1923年6月15日。
- ㊲胡宪生译:《野人记》,《小说世界》第2卷第7期,1923年5月18日。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马勤勤